

中国最古老的环保用品 —— 铜凤灯

从汉墓中发掘出来的举世无双的文物。两千多年前，西方人还穿亚麻布的时候，中国南方偏僻一隅的合浦人已经在使用有环保功能的铜凤灯了。



北海市的合浦县，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大县。它是岭南的古郡，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设置合浦郡以来，历代都是郡、州、路、府、县的所在地。

由于它盛产珍珠，又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与海外和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向来有“还珠古郡，海角名区”之美誉。

合浦县有一个特大的汉墓群，面积有 60 多平方公里，遗存汉墓近万座。

合浦汉墓群是全国已知的较为完整和规模较大的，并且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考古研究价值的古墓群。

1996 年 11 月，合浦汉墓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国家文物局将其列入十五期间国家大型遗址保护项目库。铜凤灯，就是从这一片坟墓中发掘出来的举世无双的文物。

铜凤灯的出土

自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合浦县的文物单位与上级有关单位，为了配合经济建设，抢救性地挖掘清理了汉墓 400 多座，出土文物逾万件。种类包括：陶器、青铜器、金银器、漆器、玻璃器及玉石器等等。

其中有一批精美的、全国罕见的文物，干栏式篆刻纹铜墙铁壁仓、玻璃杯、“宜子孙日益昌”玉璧及大量琉璃、玛瑙、琥珀、水晶佩饰、玻璃器皿等，铜凤灯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件。

铜凤灯展出轰动世界

铜凤灯是1972年1月在合浦县城南一座西汉晚期木椁墓出土的245件文物中的一件。它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它是一件环保用品，灯火的烟气可通过凤凰的嘴，吸纳到臀部，而臀部装有水，将烟气过滤，使房间空气不受污染。

铜凤灯曾经随国家出土文物展览先后到日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墨西哥、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等国展出，轰动世界，舆论界普遍认为，两千年前，当西方世界许多地方还处在冥迷无知的时代，东方文明却能生产这样完美的产品，真是一大奇迹。

附录 散文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与合浦汉墓文化

◆周家干 陈祖伟

秦始皇挥戈南越，开凿灵渠和桂门关分水坳，沟通了珠江水系、漓江水系和湘江水系及北部湾水系，打通了长安和中原地区至合浦的水道，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通航，奠定了基础。自“陆上丝绸之路”闭塞以后，西汉政府感觉到必须在西南开辟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汉武帝自然选择自然地理优越，物产丰富的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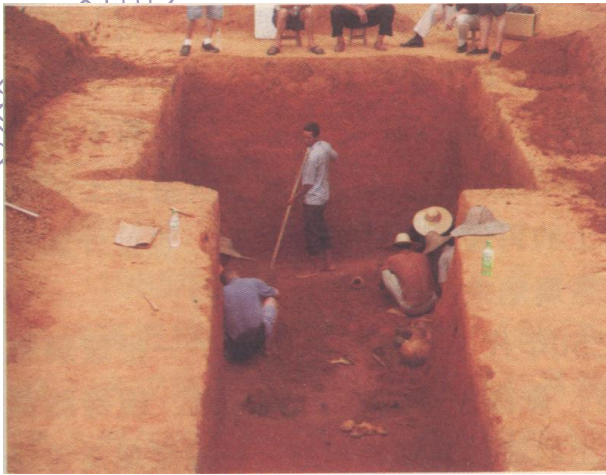
《汉书·地理志》一书中，证实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道，以合浦为中心。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沔水入长江进洞庭湖，入湘江过灵渠，进漓江，入桂江、浔江，进北流江过桂门关分水坳，入南流江，最后经合浦乾体港出海。一可过南海直达爪哇国，一可过马六甲海峡进孟加拉湾，然后过印度洋、入波斯湾或红海到达地中海沿岸的大秦（罗马）诸国。

西汉时，外国夷商跨洋越海，纷纷来中国的合浦地区或中原地区进行贸易。当时的民间贸易是以货物平等交换为主。另一方面外国使团以“贡献”的名义，将土特产“贡献”给汉朝皇帝，博得汉朝皇帝的“赏赐”。西汉元始三年（公元前3年）“黄支国来献犀牛”。汉据摄元年（公元前6年），“越裳国以三象重译献白雉”。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复献狮子，条支献大鸟，时谓“安息雀”。汉永建六年（公元166年）“叶调国遣使贡献”。汉恒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罗马）安教遣使，自日献檄外献象牙、犀角、玳瑁”。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日南檄外多来贡献”。汉朝皇帝“厚遣”这些国家，也即是将丝绸、陶瓷、珍珠、茶叶、黄金等等，赏赐给他们。并为这些使臣“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

海上丝绸之路，虽然是以丝绸、陶瓷等民间贸易而开端，但意义却远远地超过丝绸、陶瓷的贸易范围。它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如印度、希腊、埃及、波斯、罗马等和中国文化连接起来，使这些古国的文明经过海上大动脉得以交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发展和丰富。

在合浦廉州镇附近东南的清水江至禁山一带的汉墓群，面积68平方公里，长约13公里，宽约5公里，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内外著名的大型汉墓群之一。据勘探调查，汉墓保护群内，约有汉墓近万座。近三十年间，清理发掘的汉墓约400多座，出土了珍贵文物逾万件之多。其中有青铜器、玉器、金、银器、瓷器、古钱币以及舶来品香料、玻璃器皿、璧琉璃、玛瑙、

水晶、琥珀等饰物及工艺品，还有外国风格的黄金饰物。



从汉墓的结构及随葬物来看，不少汉墓的墓主是相当于翹一级官吏，或富商大贾。合浦的汉墓文物丰富，文化积淀深厚。当年中国商人从长安或中原地区出发，经合浦乾体港出海，前往东南亚诸国。“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黄金、杂缯而往……”，“杂缯”为丝织品的总称，“缯”古音读“丝”。“明珠”并非珍珠。《通典》一书中的黄支条，于明珠之下加一“玉”字乃至类也。“璧琉璃”《梵书》作“吠琉璃”，《一切经音义》言“稠利夜”，亦言“稠梨”或“毗琉璃”，以山为名，头梨山出之宝石之类。指清色的宝石，也即绿宝石和青金石。“奇石”也属于宝石之类。

在合浦发掘的每座汉墓中，基本上每座汉墓都有外国的饰物和器物。如璧琉璃、水晶、琥珀的饰物及玻璃器皿等随葬物。1975年，合浦汉墓出土文物中 useful 琥珀雕成的狮子、青蛙、扇坠等工艺品。狮子不产于我国，而产于印度、欧洲、东南亚以及非洲等地。合浦汉墓出土的琥珀狮子是从罗马（大秦）经东南亚及非洲和叙利亚输入我国。玛瑙，《三国志·魏志》和《唐书·拂麻传》等史籍记载：“大秦（罗马）多产玛瑙”。合浦汉墓出土的玛瑙最多，出土的玛瑙饰物的雕刻风格，也是外国风格，所以这些属舶来品当是无疑。

20世纪50年代，合浦汉墓出土了一批玻璃物品，有耳坠、鼻塞、环、璧、杯、盘、碗等随葬品。这些出土的玻璃饰物和器皿，经鉴定属高温烧制的钠钡玻璃，也属舶来品。

1975年，在合浦赏排三号汉墓中，出土了玻璃珠10800颗，其中有透明和半透明的，颜色有青、淡青、绿、墨绿、淡蓝、天蓝、湖水蓝、黑白、粉红、紫褐等10种颜色。形状以扁圆最多，还有椭圆、棱形、橄榄形和网坠形的，中心均穿孔。

1984年，合浦环城凸鬼岭7号汉墓出土两件加圆环形、深蓝色、半透明的玻璃饰物。据鉴定也属高温烧制的钠钡玻璃，属舶来品。

1985年，廉州炮竹厂一号西汉墓出土了椭圆形玻璃饰物，也属钠钡玻璃。1987年，合浦文昌塔70号汉墓，出土了一件属钾硅系统的玻璃杯，其造型与纹饰也属外国风格。1988年10月，合浦环城乡母猪岭一号西汉墓出土的一件半透明、天蓝色的玻璃盘。在合浦堂排三号墓出土的一件玻璃碗，也属钾硅系统，其造型和纹饰也属外国风格。1988年11月，环城乡红头岭11号西汉墓

出土一件玻璃杯。1990年6月，合浦环城乡红泥岗一号新莽时代的墓葬，出土一件湖蓝色、半透明的玻璃杯，属钾硅系统，造型属外国风格。

从已发掘的400多座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珠宝佩饰，有玻璃、水晶、玛瑙、琥珀等等，还有玻璃器皿及外国风格的黄金饰物。

世界上生产玻璃最早地区在西亚和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时间应在公元前2700年。中国生产玻璃，应在公元前1100年。汉代的玻璃进口，可分两路进行：一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二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合浦乾体港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合浦汉墓出土的玻璃器皿，是海外经印度西海岸，穿越马六甲海峡，经合浦乾体港进口。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后，埃及的玻璃制品便辗转传入中国。据《宋书》云：“大秦（罗马）国曾遣使呈文帝五色玻璃”。还有一位玻璃制造的工匠来中国，能变火石为水晶，并把技艺传授给他的徒弟。汉文帝时，外国高温烧制钠钙玻璃技术开始传入中国。是时中国开始烧制钠钙玻璃，丰富了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

晋代葛洪在《抱朴子·论仙》一书中云：“外国作水晶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这里说的“水晶碗”，即玻璃碗，交广即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地区。这是说晋代以前，两广地区的人民已掌握烧制玻璃技术。又据《南州异物》云：“玻璃本质是石，欲作品，以自然灰冶之”。由此可以推论，由于“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交通便利，两广地区的人民早在汉代便向西方学习到了烧制高温玻璃的技术，从而克服了中国传统的铅玻璃不耐高温的缺陷。

近代在马来半岛的新加坡（古属柔佛国）出土有我国汉代印纹夹砂陶和印纹硬陶。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的沙捞越河口，发现了五珠钱。在越南中部（汉日南郡地）出土了秦代青铜剑、秦代三刃山字型青铜剑和汉代青铜刀削。在苏门答腊、爪哇和婆罗洲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的中国汉代陶瓷器，其中有印纹硬陶和青白瓷和白瓷。所有这些出土的陶瓷器与合浦汉墓的及合浦汉代陶瓷窑遗址出土的陶瓷物，在造型、彩釉、花纹上都是一致的。这可证实合浦生产的陶瓷器物，早在汉代就已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东南亚诸国。通过海上贸易往来，促进了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把中华文明与印度、两河流域、波斯和埃及文明连接起来，从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输送带，它把中国灿烂而独特的文化和创造发明如丝绸、陶瓷、指南针、火药、造纸、活字印刷等技术，输送到国外，又把外国的玛瑙、水晶、琥珀等工艺品，以及香料和各种奇异动植物等输送到中国。而这些交流又使各国自身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产生了新的生机。合浦原属百粤之地，被称之为“蛮荒”。自秦始皇平定五岭后，大批中原汉人南迁，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促进了合浦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以后，合浦港成为了始发港。外国商人和使团，远渡重洋，接踵而来。他们在合浦港登岸，以琥珀、水晶、玛瑙、香料、象牙、犀角等，交换到丝织品、陶瓷、珍珠和茶叶等商品。部分外国商人则溯江而上，直抵古都长安及中原地区进行贸易。当时的民间贸易是平等交易，合浦人民在与外国商人的贸易交往中，受到外国商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潜移默化，使当地的文化多

少带有了一些开放性。这一点，可以从合浦汉墓出土的舶来品中得到证实。

“海上丝绸之路”与合浦汉墓的文化遗存，是汉朝劳动人民智慧和实践活动的结晶，其文化价值体现在其所包含的人类智慧和实践创造的力量，它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已挖掘的古汉墓

沧海遗珠汉墓群

沧海桑田巨变之手，将一把岁月之珠，深深地嵌进了古越大地，披历着两千年的历史烟雨，向人们展示着南珠故郡的厚重文化底蕴，这就是合浦汉墓群。

合浦汉墓群，南起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乾体港之东，北至新石器时代遗址——廉州清水江以南。方圆 70 平方公里范围内，遍布着 8500 座汉墓。如此规模庞大的古汉墓群，在古称百越南蛮之地的岭南地区，可谓独一无二。

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在合浦汉墓中陆续出土的文物如铜凤灯、铜屋、铜仓、玛瑙、琥珀、陶屋、陶皿和瓷器等，特别是被称为“岭南第一马车”的铜母马车、铜牛、铜狗、铜鸽等，都印证了合浦汉代前后社会发展的许多重大史实，为研究古越文化和汉文化的融汇与交流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也给后人留下了疑问：合浦大规模的汉墓群因何而成？翻开合浦汉代的人口记录，《汉书·地理志》中记述：“合浦郡，户 15398，口 78980，县五”。而《后汉书·郡国志》中记载的人数则是：“合浦郡，五城，户 23121，口 86617”。由此看来，合浦四百年间的人口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这些人口记录包括了当时合浦郡内的广东徐闻县南、阳江市北、新兴市南等地区的人口在内。在上述地区中，迄今为止，除了徐闻县发现有 300 多座汉墓葬之外（西汉时，徐闻曾一度作合浦郡治），在今合浦以外的地区均没有发现大规模汉墓群的报道。而今合浦境内的汉墓葬就占了当时总人口的 5%，这不但是一个古墓群奇观，更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大科研课题。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汉代以后的唐宋元明清历朝中，合浦多次改为州府，虽然在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地位都日趋重要，但却再也没有形成像汉墓群那样庞大规模的墓葬现象。这是为什么？值得我们研究。

据《新唐书》记载，合浦郡自贞观八年（即公元 634 年）更名为廉州府时，“户 3312，口 13219”，即使加上当时从合浦划出墩置白州的 2574 户，9498 人在内，也只有 5886 户，22717 人。两州共

领八县，人口却仅为领五县或五城时的汉代合浦人口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合浦汉墓群的形成和存在，除了与当时的人口规模有密切关系之外，还十分明确地反映出合浦在汉代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因此，只有从合浦郡在汉代的社會作用及相关的历史事件入手，才有可能探究出合浦形成如此大规模汉墓群的原因。



本文试从秦汉至两晋间，在合浦发生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合浦在此前后的民族状态，地理与行政区域归属的变迁中，对合浦汉墓群形成的可能条件，作一家之谈。为什么要把年代下限确定至两晋呢？因为汉以后的三国和两晋，其社会生活和时代特征均沿袭汉制，意识形态和社会规范仍处于汉代的时代影响之中，所以将此二者相提并论，较有说服力。

一、合浦在秦汉前后的民族状态和地理归属。

合浦古属南蛮百越之地。“蛮”在古代是地域的指称：“南方日蛮”（《文献通考》）。“越”是南方越族之称。合浦是乌浒越族部落居住的地方。“乌浒”一词的读音，据考证是壮族中“瓯越”的谐音（《壮族通史》）。合浦最早的氏族居民是“瓯越”，亦称“乌浒蛮”。骆越瓯越和乌浒都是壮族的先民，居住在合浦称作“乌浒蛮”的早期部落是壮族先民而不是汉族先民，这是春秋战国以前的状况。在古越语中，“瓯”是“乌浒”的同音异字，“乌浒”亦写作“乌浦”、“合浦”。

合浦乌浒蛮在百越部族中属于大族。楚国时的吴起，从秦始皇开始至汉武帝多次出兵征战百

越南蛮时，均受到当地越蛮的强烈反抗，“合浦乌浒蛮反叛，招诱九真、日南（越南北部），和数万人”。汉灵帝时，郁林太守谷永恩一次招安的乌浒蛮就达十万之众。由此可见，合浦境内外的乌浒蛮力量已相当强大。

乌浒蛮的称谓在三国以后逐渐消失，这是汉王朝着意加强合浦区域的作用以及乌浒蛮与大量中原汉族移民日渐同化的结果。

合浦编辑的许多书籍通称的：“合浦于汉元鼎六年建郡”。这只是指汉王朝正式在合浦建立起政权行政区，设立权力机构，合浦作为乌浒蛮的势力范围，一直都具有与中原王朝抗衡的部族实力。合浦建郡，标志着南方越族部落与中原汉族同化的开始，因此，不能以合浦建郡作为区域断代，合浦建郡只是南蛮百越乌族人历史阶段中的一个年限断代。早在春秋楚成王恽元年间（公元前674年），楚国向南扩张时就有“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楚是七闽之霸，对蛮夷也只能“抚”而待之，可见，合浦等地的乌浒蛮在当时已是一个独立的部族。到了楚悼王时（公元前401—公元前308年），任用名将吴起为相，“南平百越，遂有洞庭、苍梧”。这时合浦的乌浒蛮部族仍然是独立于朝廷之外。即使是在“楚子称霸，朝贡百越”的时期，南蛮百越虽然已是楚国的属地，但也只是朝贡关系的存续。合浦与其他百越地区一样，事实上已存在着独立的行政区域，不过实行的是部族制度，而中原汉族已进入了奴隶制社会。

这一点非常重要，说明了合浦建郡只是一个年限断代，而不是行政区域断代。建郡前的合浦是乌浒蛮的氏族部落制度，建郡后的合浦是奴隶封建社会制度。建郡后的合浦，进入了汉族统治社会，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和飞跃——从氏族部落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制度。

二、秦始皇统一岭南，汉族统治者及汉族人口开始迁徙合浦等岭南地区。

秦始皇平定六国，统一中原后，于始皇二十八年冬（公元前219年）挥师50万出兵岭南，经过六年的苦战，统一了岭南地区，并着手在岭南推行中原的郡县制度，设置了桂林、象郡和南海三郡，合浦地属象郡。当时的象郡包括了越南北部、中部，广西西部，广东西部，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合浦正处在象郡和南海郡的结合部。这就是史称的“秦并天下，威服蛮夷”。秦始皇统一岭南，带动了中原汉族人口迁徙百越南蛮之地，形成了汉族人口进入合浦等越蛮地区的第一次高峰。这个时期进入合浦等地的汉族人口，除了政府官吏，士兵之外，还有大量的劳动人民。据史籍记载，秦始皇除了在50万大军中留下了大量的兵士镇守三郡外，又在中原迁徙数十万狱吏、商贾、赘婿、役夫到岭南来“与越杂处”，组成了岭南地区最早的汉族群体。合浦处于象郡与南海郡之间，又是乌浒蛮势力最强的地区，按照“与越杂处”的原则，当时进入合浦的汉族居民肯定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

三、南越古国的建立，相对偏安发展的社会环境，形成了中原汉族迁徙合浦的第二次高峰。

秦始皇虽然设置了桂林、象郡和南海三郡，却只在南海郡设了个南海尉来统领三郡，秦朝末年，中原农民大起义，南海尉赵佗趁机起兵割据三郡，自封为王，成立了“南越国”。赵佗统治南越国期间，推行“越渗和亲”，“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积极吸引中原汉族人士，引进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南越国”偏安的九十三年中，大量的中原汉族纷纷南下“与越杂处”，开发岭南，

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特别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影响，大批难民为躲避战争而进入相对偏安的“南越国”，致使汉族人口激增。这时，在岭南“与越杂处”的汉族人口数量已经相当庞大，这些人主要由以下几个群体组成：

秦始皇 50 万征战大军中留下的镇守士兵；

从中原调拨的数十万狱吏、商贾、赘婿、役夫等；

赵佗为解决士兵婚姻问题，向秦始皇请求三万尚未成家妇女，而秦始皇只“可其万五千人”；

秦末农民大起义逃避战火的难民；

南越国九十三年偏安期间，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大量的谋生百姓。

这几部分汉族人口，都是最具生存、发展能力，生命力最强的群体，他们当然懂得选择有利的来生存发展，合浦在三郡之中地理环境最优越，必然是中原汉族迁徙的首选。

相传，合浦东山寺曾是南越王赵佗的行宫。东山寺位于廉州古城东北，处在中原古道旁。合浦糠头山，相传也是赵佗出兵合浦平定蜀王子之乱，在此舂谷取米，糠头堆积如山而得名。但中原汉族迁徙合浦的人数是否因此倍增，这还有待求证。

中原汉族万里而来，叶落归根者寥寥无几，墓地的选择，也就成了离乡背井的徙民们，入土为安的最后寄托。

四、汉武建郡，马援等多次出兵交州，征战“蛮夷”，大量的中原汉族随之迁徙合浦，开创新家园。

公元前 111 年，也就是汉元鼎六年，汉武帝出兵平定了南越古国，撤销了岭南三郡，“遂以其地为……九郡”（《汉书·地理志》），合浦郡是其中之一，这就是常称的“合浦汉武建郡”。

合浦郡是九郡中实力最强者之一，统领五县，管辖人口 78980。在两汉期间，随着珠市建立和“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官吏升迁，役夫征调，商贾汇集，流动人口自然激增，这些流动人口绝大多数来自中原汉族。而当时合浦作为始发港所在地，郡治都市，种种有利条件使其成为岭南第一大郡，辖地广至广东徐闻、阳江、新兴，横跨广西南部 and 广东西南部（尚有朱卢县地望无考，《后汉书》称“朱崖”，疑与越南交界处），因此大量中原汉族人口进入合浦是必然的。

这个时期合浦的汉族人口与越族（壮族）人口的比例是多少，没有具体的资料。但从其后的唐代人口记录中可见一斑。据《旧唐书》列举的廉州人口数字，当时廉州总户数是 3030 户，人数是 13029。其中壮族人口有 1522 户，人数是 4262。户数虽各占一半，但汉族人口已是壮族人口的三倍。由此可见，秦汉以后，合浦汉族人口激增的盛况。

造成合浦汉代汉族人口激增的重大事件中，首数马援两次征战“蛮夷”。

其一是建武十八年（公元 42 年），马援和段志率 10 万精兵征交趾“二征”（在此之前，已有多次征讨），军至合浦，楼船将军段志病死，马援接管段军部属，在合浦整军兼建造战船两千余艘（今合浦石康境内留有马援建造铜船、操练水军的遗址——铜船湖），操练水师，很快便俘获“二征”首领，大获全胜。接着，又以合浦为基地，率两万将士直击九真（越南北部），大捷班师。但马援的将士也死伤惨重，其中因水土不服，染上瘴疫致死者，占部队人数的“十之四五”。也就

是说，包括楼船将军段志在内，有一半官兵死于瘴疫，加上战死者，数量是非常惊人的。

“二征”造反之时，“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后汉书·南蛮列传》），由此可见，合浦是主战场之一，士兵死亡，大部分是在合浦就地埋葬。葬于黄土，筑墓作记。

其二是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62岁的马援见朝廷屡次出兵征讨武陵蛮均失败，甚至全军覆没，于是请缨出征，光武帝诏令合浦、长沙两郡作为后援基地，准备兵员、粮草、车船、马匹，于是大批军队役夫集结合浦。马援得心应手，大获全胜班师，留下的是大量的役夫民工。

两次重大战役，合浦首当其冲，除了大量达官权贵汇集庆功邀赏之外，更多的是战死的将士们留在夕阳中的青土冢。

从秦始皇“始开领外”到汉武帝最终平定岭南，其间二百六十多年，大小战役无数，据史书记载，秦始皇50万大军兵分五路进入岭南时，仅征讨西瓯、骆越的第二路军在与瓯越、乌浒蛮的战斗中，就“伏尸流血数十万”（《后汉书·南蛮传》）。汉武帝征交趾时，更有全军覆没的惨剧。难计其数战死的下级官兵只能魂断合浦，墓葬珠乡。

因此，合浦汉墓群的产生和形成规模，都与这些历史事件密切相关。

五、是“海上丝绸之路”开拓，合浦作为始发港地位而带动的珠市繁荣，随之而来的是中原汉族人口迁徙合浦的又一次高潮的到来。

在春秋战国以前，合浦珍珠就是中原与百越交流贸易的主要物质形态之一。在一些文献记载中，就有“九夷、十蛮、越沔，剪发文身”的描述。早在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商朝第一任大臣伊尹的“诏四方令”就明确提出“请令珠玕……为献”。到了汉代，“珠还合浦”的典故更是传扬华夏。但是，在秦汉以前，合浦珍珠只是以贡品形式“为献”，秦汉以后才日渐成为税赋的重点。至三国时，东吴王朝更是“虑百姓私散好珠……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益蜀除”。珠市官营化的程度已相当高了。

“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地位的形成，珠市的繁荣带动了中原和海外商贾的人流、物流汇集合浦，大批的中原商贾南下经商，迁居发展，合浦是最理想的定居地。因为，合浦是汉代惟一的出海通道和对外贸易港口所在，又是东南亚各国作为对外开放的新兴重镇，还是各国进入中原的桥头堡。客来如云，生居死葬，无疑又是汉墓群形成的社会因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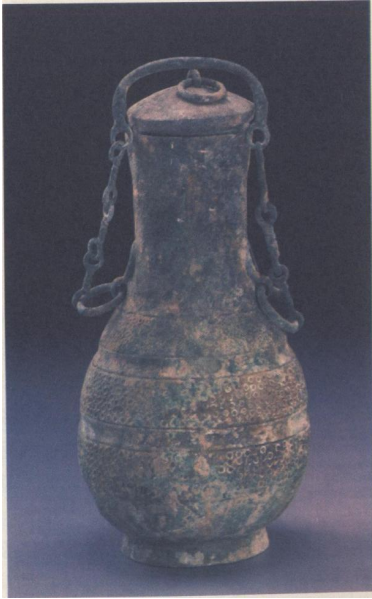
六、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合浦迅速成为中原汉族人士迁徙聚居的中心。

经过秦汉的发展，合浦奠定了岭南重镇的地位。特别是三国东吴对合浦的管辖期间，又迎来了合浦吸聚汉族人口归依的第四次高潮。

据《三国志·吴书》记载，“权以交趾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合浦分在广州范围内。自此以后，合浦就多次在广州交州之间分来分去，成为交、广二州的缓冲地带和分界线，更是兵家征战必争之地。时代风云又一次将合浦卷进社会变革的中心，人口结构也随之剧变。

合浦以北划入广州不久，东吴又取消了广州建制，合浦复归交州。永安六年（公元263年），交趾郡守将叛吴投魏，吴国又再度分交、广二州，广州属吴，交州属魏，合浦归广州，处交、广二州交界，夹于魏吴势力交接点之上。

为了夺回交趾，吴以合浦为前沿阵地，与魏展开了拉锯战，四年之间，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前三次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宝鼎三年（公元268年），战败后“兵还合浦”；第二次是建衡元年（公元269年），吴军“就合浦击交趾”，又是铩羽而归；第三次是建衡三年（公元271年）初，结果是“败，退保合浦”。是年底再战交趾，终于夺回了交州（以上均见《三国志·三主传》）。在这四年间，频繁的调兵遣将，自然使合浦的汉族人口激增，但是，作为两国交战的核心战场，士兵阵亡何止千万。荒冢连片之中，尽是北望中原的汉人亡魂。



东吴统治合浦的六十多年间随着频繁的战事，仓促的军队调动，大量的官吏士兵往来，士族地主官僚势力也迅速兴起，合浦已由南蛮越族之地，彻底转化为汉族郡治中心，达官权贵聚居之地，士燮家族就是其中一例。

士燮自汉末即为官，至任交趾太守时，他的三个弟弟分别任合浦、九真、南海太守，一门四杰“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馨，备俱威仪……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佗不足也”。豪强如此，连南越王赵佗也望尘莫及。士族地主官僚的生活方式极尽斗富夸豪之能事，墓葬陪葬之风日炽，对合浦地区汉墓葬的影响深远，这从合浦汉墓中出土的陪葬品中可以得到印证。

七、相对稳定的人口状态。汉末三国至两晋，中原人士为避战乱大举南迁合浦，形成了第五次人口增长高峰。

合浦自汉设郡的四百多年间，人口始终处于稳定增长状态。至三国、两晋，虽然行政区域变化较大，但人口却稳中有升。期间虽有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王莽新政动乱，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给中原大地造成了极大伤害，却没有波及岭南、合浦地区。相反，中原人士及士族官僚为避战乱而大量迁徙岭南、合浦等偏安地区。如上所述，士燮四兄弟分别在合浦、交趾为官时，中原士族“往依避难者以万数”。为求生存而“往依避难者”的普通百姓更是难以计数。这些汉朝的遗老遗少们，在朝代变更中避乱于斯，死葬于斯，身死他乡之后，仍期待着魂归中原。

通过以上诸方面的历史检索，我们不难看出，合浦之所以形成如此庞大规模汉墓群的历史条件，时代环境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因素。

这里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合浦汉墓群大都集中在“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至新石器时代遗址一带？是巧合还是某种内在的因素在作用？笔者认为是在内在因素的作用，其原因有二。

首先是中原古道的归属感。沿新石器时代遗址（即廉州清水江一带）向东北方向进发，是古越连接中原的古道。秦汉以来，官吏升迁，役夫调动（如作为马援征武陵蛮的后援兵力基地），从中原而来，或返回中原，陆路都是走此古道。当年孟尝、费贻等官员离任返朝廷，也是沿此至大廉山下送别留名的，汉墓选址于此，有北望中原，让思乡灵魂认路归乡的寄寓，这是符合当时中原丧葬风俗的。其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吸引作用。古代移民多走水路，这是无车船轿马的老百姓所能选择的最经济省力的方式。大量的中原移民沿运河入桂江，过灵渠进南流江，来到终点

合浦。生的时候沿此路而来，死了也让灵魂沿此熟悉的通道而回，依古港口而葬，是魂归家园的最直接途径。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是中国人千古不变的乡土情结，魂兮归去，是回归故里的最大慰藉。

合浦汉墓群不仅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更是一座巨大的人类文化遗产宝库。这座宝库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几千座古墓里难以计数的、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更在于这里延续着千古珠乡的民系发展、社会变革、时代风云和人类文化。她为后世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及因此产生的难以估量的经济价值（如考古科研、旅游观光、市场开发等）和无形资产。

今天，如何加强对合浦汉墓群的科研保护，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紧迫而又繁重的任务，更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挖掘的汉墓现场



汉墓博物馆大门

汉代贬徙合浦的官员

当年，宋代的大文豪苏轼遇赦北归，从流放地海南儋州渡海来到合浦小住候任，使得珠乡人对他怀念不已，叹息不已。其实，早在苏轼以前，被流放到合浦的贬官大有人在，特别是在汉代的流放官员中，更是多有皇亲国戚和贵族王侯。

据笔者在搜寻史料时的不完全统计，汉代贬徙合浦的官员中，有王后一名，国丈二名，封侯者十二名，附马都尉一名，尚书、京兆尹至太守以上高级官员八名，郡功曹、黄门郎、郎中令各一名，还有一人是篡汉建立新朝称帝的王莽之子的大舅父。

造成如此众多的高级朝官贬徙合浦的原因有三：一是朝廷内部帝后党之争，排斥异己；二是权力倾轧中奸臣得势，忠良被陷害；三是王莽篡汉前后为建立个人势力而弄权逐臣。

这股贬官员流放合浦的漩涡起于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24年），计有：

王章，因忠直敢言，奏宠臣王凤专权，被王凤陷害入狱，严刑至死，妻子徙合浦，时为公元前24年。

淳于长，汉成帝时宠臣，封定陵侯。时称“贵化碳公卿”，因与王莽有矛盾，以谋立左皇后大逆罪致死狱中，妻子徙合浦。时在公元前8年。

傅晏，大司马、封孔乡侯，哀帝傅皇后之父，在与王莽争权中失败，全家流放合浦，时在公元前1年。

董恭，哀帝时封关内侯，在与王莽争权中失败，被抄没家产（史载董氏家财四十三万万）后，全家流徙合浦，时在公元前1年。

董宽信，董恭之子，时任附马都尉，与其父同时被贬，流放合浦。

董贤，哀帝时封高安侯，大司马，董恭之子。在与王莽争权中失败，被贬合浦，董贤夫妇自杀，其家属合浦。

孙宠，哀帝时封方阳侯，因与宠臣结党作谋，陷害大臣，免官流徙合浦，时在公元前1年。

右师谭，哀帝时封关内侯，与孙宠结党作奸，同时免官合浦。

息夫躬，哀帝时封宜陵侯，因结党作奸，被斩于市，其妻子流徙合浦。

丁明，汉平帝时封安阳安侯，大司马，后贬官流徙合浦。

吕宽，汉平帝时参与王莽争权，被流放合浦，王莽当政后，获赦并与王莽结成宗舅之亲。

张由，哀帝时封关内侯，因陷害大臣被免官流徙合浦。

杜业，哀帝时封建平侯，王莽当权后，对杜业的言论不满，免官流徙合浦。

史立，平帝时任太仆，王莽当权时免官流徙合浦。

丁言，平帝时任泰山太守，王莽当权时免官流徙合浦。

冷褒，平帝时任郎中令，王莽当权时排除异己，被免官流徙合浦。

段犹，平帝时任黄门郎，王莽当权时排除异己，被免官徙合浦。

卫宝，汉平帝时国丈，王莽当权时被排斥贬徙合浦。

卫姬，汉平帝为平帝后，王莽弄权尽诛卫氏支属，将卫皇后免去后位贬徙合浦。

郭璜，东汉和帝时为长乐少府，因株连案被杀，家属流徙合浦。

郭举，郭璜之子，时为侍中兼射声校尉，因株连案被杀，家属流徙合浦。

桓晔，东汉献帝时任郡功曹，为当时名士，因被陷害死于合浦狱中。除上述人物之外，尚有一些官员被降免职后，议流合浦的，但这些官员宁愿自杀也不肯到合浦。如东汉时的邳寿，为官清廉刚正，由举孝廉升至刺史，尚书令，京兆尹，任至尚书仆射。因不肯附和权贵枉法被陷入狱欲置死，后得同僚营救改流徙合浦，邳寿出狱后自杀。

以上这些都是太守以上职级的朝廷官员，除个别外，食禄都在二千以上，相当于后世的三品官阶。他们流徙合浦，必然对合浦的社会形态产生相应的影响。他们之中，除极个别有机会重返中原者之外（如吕宽依附王莽），绝大部分只能魂断殊乡，在这个意义上说，也为合浦境内 8500 多座汉墓群的形成及期间出土的珍贵文物所揭示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内涵留下了很具说服力的注脚，更为合浦汉墓的考古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